

# 趙季康奉命寫《五朵金花》

## 影壇往昔

1959年初，文藝界掀起向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的熱潮。周恩來十分注重這些為國慶趕出來的作品，對送上來的作品親自過目，當他看了《鋼鐵世家》、《萬紫千紅總是春》等影片後，對當時電影界存在的政治口號太多、缺少美感和輕鬆愉快的狀況很不滿意。他將當時的文化部部長夏衍找來說：「你不久前不是去過雲南大理嗎？是否寫一部以大理為背景、反映邊疆少數民族載歌載舞的喜劇影片？」夏衍說：「我不熟悉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但可以推薦一個人來寫。」

夏衍要推薦的那個人就是趙季康。趙季康是浙江嘉善人，16歲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曾任昆明軍區《國防戰士報》記者。1960年轉業到作協昆明分會為專業作家。她的作品多反映西南少數民族生活，筆調細膩委婉。

### 減去兩朵金花

不久，雲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根據夏衍的指示將趙季康及丈夫王公浦叫到昆明，在作了一個簡短的說明後，對他倆說：「給你們一個禮拜的時間，趕快編個故事，要是編不出來，國慶就趕不上了。」「一個禮拜？這麼短時間能寫出來嗎？」趙季康聽了有些急。好在她和丈夫早在1955年曾經去過大理，趕過「三月街」，對「三月街」的賽馬和其他風俗很熟悉，兩人便決定用賽馬作為電影的開場戲，並以此為基礎，不到一周便寫就了電影《七朵金花》的提綱。

4月中旬，趙季康赴北京寫稿，王公浦則到大理進一步搜集創作素材。趙季康花了兩天兩夜便寫就了劇本《七朵金花》的初稿。

劇本交到夏衍那裡，夏衍給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就某些故事情節及藝術表達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對趙季康說：「這個劇本可以拍3部電影了，一部電影只有105分鐘，你應該心中有數，劇本拍成電影還得花大力氣改編。」趙季康於是又對劇本進行了大幅修改，把原來的「七朵金花」改為「五朵金花」，減去了「水庫上的金花」和「採茶金花」。夏衍看了修改後的劇本很是滿意。不久，《五朵金花》的劇本在刊物上公開發表並獲得了好評。

劇本出來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導、怎麼拍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特執導《五朵金花》的任務交給了長影導演王家乙。夏衍叮囑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號，要表現出山河美、人情美，這部片子的主題就是社會主義好！」

王家乙看到劇本後，為慎重起見，他又帶着作者

趙季康及作曲家雷振邦一行五人來到大理看外景。在大理古城住了四五天，王家乙卻怎麼也找不到拍電影的感覺。作曲家雷振邦問趙季康：「能不能把對話改成對歌？」

趙季康一聽精神一振，說：「可以啊！」並即興朗誦了一首：「陽雀飛過高山頂，留下一串響鈴聲……」雷振邦一聽高興了：「太好了，真是太優美了！」王家乙聽了趙季康的朗誦，情緒也一下子上來了，說：「好，好，就按這個調子寫。」

「大理三月好風光，蝴蝶泉邊好梳妝，蝴蝶飛來採花蜜，阿妹梳頭為哪樁……」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趙季康思如泉湧，一口氣寫完了《五朵金花》中所有的歌詞，雷振邦又花幾天工夫為歌詞譜好了曲。

### 楊麗坤偶然被選中

劇本定稿後，王家乙帶着一班人馬在雲南開始到處挑演員。不久，「四朵金花」都名花有了主，男主角也選定了莫梓江。只是戲中重要人物女社長金花這個角色卻一直沒有着落。一天，王家乙抱着試試看的心理來到雲南省歌舞團，看了一圈沒有一個中意的。正當他往外走時，一個正站在排練廳的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在他們經過時，有人跟這位姑娘打了個招呼：「楊麗坤！」「哎！」姑娘應聲抬頭，一張純真、質樸的微笑着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的眼簾。

「就她了，就是她了！」王家乙高興得大叫起來。《五朵金花》女主角就這樣定了下來，那一年楊麗坤16歲。楊麗坤不僅天生麗質，富有表演才能，還十分刻苦努力。她的表演樸實、自然，分寸感把握得很到位，把一個白族少女不加雕飾的美麗、大方、質樸中流露出的對生活、對愛情的熱愛、渴望表現得惟妙惟肖。

周總理對她的表演也是稱讚有加，還會兩次帶着她出國訪問。當周總理得知《五朵金花》是別人配的音後，還勉勵楊麗坤嚴格要求自己，早日學好普通話。

《五朵金花》這部影片先後在中外46個國家放映，有的觀眾，包括賀龍元帥，看了10遍也不厭。當時的陳毅副總理每次出訪最喜歡帶上這部影片。

如今，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五朵金花》並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2000年在全國「百年最佳影片」評選過程中，《五朵金花》被評為10大影片之冠。

《五朵金花》的巨大成功讓趙季康收穫了成功的喜悅。作為一個作家，作品得到認可，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沉浸在喜悅和幸福中，趙季康和同為作家的丈夫王公浦度過了生命中短暫而美好的快樂時光。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賈知府看了又看，卻不知所云。  
師爺告訴他，這首歌謠是一帖「護官符」，做官的若弄不懂，輕則丟官掉職，重的性命遭難。

歌謠說的是：金陵住着四大家族：賈家是皇親國戚，史家和王家豪門巨富，還有一家姓薛（與「雪」諧音），也是有錢有勢的富紳。四大家族姻親關係密切，互相勾結，權勢炙人，誰也惹不起他們。當官的要想保住烏紗帽，千萬不能觸犯他們。

賈知府聽了師爺這番話，如夢初醒，哪裡還敢到薛家拿人？便將死者以暴病身亡而草草結案，以此討好財大氣粗的薛家。這是古典長篇小說《紅樓夢》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中的一個小故事。

故事反映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揭露衙門豪門勾



▲楊麗坤擔演《五朵金花》女主角

然而，快樂總是短暫而炫目的。在可怕的政治運動中，《五朵金花》成了「宣揚資產階級情調」的大毒草，趙季康因之受到了迫害，殘酷的政治運動扭曲了真實的人性。1966年，趙季康與丈夫王公浦離婚了，結束了夫唱婦和、比翼雙飛的甜蜜時光。趙季康一人帶着兒子開始了生命中最黯淡的時光。

1968年，趙季康被押送到昆明「五七」幹校勞動，一次次的批鬥摧殘了身心健康。趙季康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已經無法正常勞動，身心俱瘁的趙季康再也無法忍受這種陰暗無光的生活了！

### 永遠離開了銀幕

美麗的七彩雲南給了趙季康事業的成功和愛情的甜蜜，但伴隨着殘酷的政治運動，這片美麗的紅土地也給趙季康留下了心靈中難以痊愈的傷痕。離開王公浦，趙季康再婚後又離婚。1978年，趙季康孤獨地離開了她曾經深深愛過又深深恨過的七彩雲南，回到家鄉浙江。1984年，53歲的趙季康獨自到了美國，開始了旅美寫作生涯。

那個非常年代，不僅趙季康，許多無辜善良的人們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五朵金花》的金花扮演者楊麗坤，在政治運動中慘遭迫害，身心俱殘致精神錯亂，從此活在一個寂寞的世界中，永遠離開了她喜愛的銀幕。

摘自《翻閱日曆》作者：劉 連

結之無法無天。這正是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伸張正義」的主題之一。《紅樓夢》又名《金陵十二釵》，乃清代小說家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之作。1981年至1982年4月，中國發行了「《紅樓夢》——金陵十二釵」郵票一套十二枚和小型張一枚，編號T69。郵票和小型張採用的是畫家劉旦宅創作的原畫。

十二枚分別為（見圖）：黛玉葬花、寶釵撲蝶、元春省親、迎春誦經、探春結社、惜春構圖、湘雲拾麟、李紈課子、鳳姐設局、巧姐避禍、可卿春困、妙玉奉茶。小型張為「雙玉讀曲」。



全神貫注

王鉅科 攝

## 歌聲

朱自清

昨晚中西音樂歌舞大會裡「中西絲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彷彿一個暮春的早晨，霧霏的毛雨默然灑在我臉上，引起潤澤，輕鬆的感覺。新鮮的微風吹動我的衣袂，像愛人的鼻息吹著我的手一樣。我立的一條白礬石的甬道上，經了那細雨，正如塗了一層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覺越發滑膩可愛了。

細雨如牛毛，揚州稱為「毛雨」。這是在花園裡。群花都還做她們的清夢。那微雨偷偷洗去她們的塵垢，她們的甜軟的光澤便各自煥發了。在那被洗去的浮氈下，我能看到她們在有日光時所深藏着的恬靜的紅，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與綠。以前錦繡般在我眼前的，現都有了黯淡的顏色

。是愁着芳香的銷歇麼？是感着芳香的睜倦麼？大約也因那濛濛的雨，園裡沒了濃郁的香氣。涓涓的東風只吹來一縷饑餓了似的花香；夾帶着些潮濕的草叢的氣息和泥土的滋味。園外田畝和沼澤裡，又時時送過些新插的秧，少壯的麥，和成蔭的柳樹的清新的蒸氣。這些雖非甜美，卻能強烈地刺激我的鼻觀，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聽着；也用心唱着。我終於被一種健康的麻痺襲取了。於是為歌所有。此後只由歌獨自唱着，聽着；世界上便只有歌聲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 大理的三月街

## 華夏風情

每年農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舉行的三月街是一個有着一千多年歷史的大理各民族物資文化交流的傳統盛會，古代又稱觀音市或觀音會。

三月街市場位於點蒼山中和峰麓，傍古城、眺洱海，地勢廣闊、風光秀麗。據清代刊印的佛教故事集《白國因由》所說，在南詔細奴邏時期（唐永徽年間），觀音於農曆三月十五日到大理傳教，並制服了魔王羅刹。為感謝觀音的恩德，每年到期，信徒們搭棚禮拜誦經，並「以蔬食祭之，名曰祭觀音，後人於此交易，傳為觀音街。」觀音入大理只是傳說，大理是西南陸上絲綢之路的要衝，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地區優勢才是三月街千年不衰的主要原因。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有機會遊了兩天三月街，先後記下了當時的情景：「俱結棚為市。環繞紛錯……

千騎交集。……男女雜沓，交臂不辯。……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蠻物亦無不至。」清末修的《大理縣志稿》記載的更為詳盡：「盛時百貨生易頗大，四方商賈如蜀、贛、浙、桂、秦、黔、藏、緬等地，及本省各地州縣之雲集者殆十萬計，馬騾、藥材、茶市、絲綿、毛料、木植、磁、銅、錫器諸大宗生理交易之。至少者值亦數萬。」清光緒年間，大理首批留日學者李燮義有一首《竹枝詞》，描寫了三月街的盛況：昔日繁盛幾春秋，百萬金錢似水流。川廣蘇杭精巧貨，買賣商場冠亞洲。三月街發展到今日，不僅已成為涉及二十多個省市地區的物資交易會，而且還是大理各民族進行文化藝術交流、招商引資、技術合作等對外開放的重要集會。屆時舉行傳統的賽馬、對歌、賽龍舟、民族歌舞等文藝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的大批遊客。三月街在新時期已成為雲南西部最盛大的商貿集市、大理各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周總理生前在評價電影《五朵金花》時說：「美

好的生活，美好的人。」三月街確實是美好的人民在美好的時節、美好的風光中展開的獨具風姿的民族盛會。它牽動着無數人的心弦，招引着許多慕名而來的遊客。農民們到這裡出售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如珍貴的藥材和精美的草編、大理石製品，或者在街上選購耕田、擠奶的牛，運輸的馬；姑娘們到這裡製備自己終身大事的嫁妝；老人們有興致地帶上小孫子來街上為全家採購生活必需品，或者飽一飽眼福。藝術家們則不遠千里趕到這裡，收集反映民族風情的創作素材。還有許多人則不一定是作買賣的，卻總是以逛一趟三月街而感到愜意。



大理三月街舉行的賽馬活動



▲李立三與夫人李莎合照

## 為人執事

# 李立三與冼星海一段往事

1945年春，戰爭即將結束時，我們家裡又增加了一個新住戶。那天立三下班回家對我說：「有一個中國同志剛從哈薩克斯坦來莫斯科，沒有地方住，我想把他請到家裡來，你看行嗎？」

我毫不猶豫地答應說：「行，行！他什麼時候來？」「馬上會來的。」

不一會兒，客人果然來了。他是個中等個兒、身材瘦削、五官端正的知識分子，文質彬彬，待人和藹。他的手指與眾不同，纖細而修長，引起我的注意。我想，會不會是搞音樂的？一問，果然沒錯。

我說：「我一着您的雙手，馬上就猜出來了。很抱歉，還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叫冼星海。」

冼星海，中國現代音樂史上的巨人，他的名字現在家喻戶曉，但當時還鮮為人知，我就不了解。向立三細問才知道，冼星海曾在巴黎學習西洋樂，回國後努力把西方音樂原理和中國民族旋律相結合，寫出了震撼世界的《黃河大合唱》等許多優秀作品。他是一個滿懷愛國主義激情的熱血青年，很早就參加了革命，1938年入黨，抗日戰爭時期到了延安，繼續從事音樂創作。1939年蘇聯導演卡爾門來華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大型紀錄片，冼星海接受了為該片配樂的任務，隨同卡爾門前往蘇聯。他長期患有肺病（這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的常見病），延安缺醫少藥，黨組織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希望他在蘇聯能治好病。

不料，冼星海在蘇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坎坷。他順利完成為抗戰影片創作音樂的任務後，便迫不及待地動身返回延安。但此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回國路線受阻，冼星海被迫滯留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又和蘇方接待單位失去了聯繫。他人生地不熟，在蘇聯沒有合法身份，領不到糧票，又身無分文，只能在舊貨市場賣掉一些自帶的衣物維持生計，處境非常窘迫。戰爭接近尾聲時，他才經過一番周折來到莫斯科。

這裡他沒有一個熟人，俄語也講不清楚，只聽說莫斯科有個外文出版社，那裡能找到中國同志。

冼星海一下火車，便直奔出版社中文部，碰到的第一個中國人就是立三。他們兩人原來素不相識，但立三了解到冼星海的處境後，當場答應幫忙，讓他到家來住下。我聽到冼星海的坎坷故事，也十分同情。冼星海離開延安時指定到共產國際機關接洽，但此時共產國際早已解散，不復存在，他該找誰呀？立三給他出了個主意，只有找紅十字會，重新辦手續。但我知道，這是需要時間的。不怕客人住的時間長，只怕住得不方便。我們家連一張多餘的床都沒有。

立三說：「沒有關係，讓客人睡我們的床吧，咱們倆將就一點兒，睡木板地也行。」

我們在地上鋪開一個薄薄的褥子，就這樣睡了一兩個月。

冼星海是很謙遜、懂禮的人，談吐文雅。他不懂俄語，但會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英語也很不錯，我和他用法語交談。他最喜歡和一歲多的小英娜玩耍，經常逗她笑，要不就在屋裡玩捉迷藏。看得出來，他是很愛孩子的，每當他把小英娜抱在懷裡，臉上就會流露出善良、溫柔的微笑，平時的愁容也變得開朗起來。

多年的苦難、無情的病魔無形中給他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他時常拿出一把帶在身邊的小提琴，站在窗邊演奏以排遣內心的鬱悶，拉的都是一些我不熟悉的東方樂曲，大概是他自己創作或即興發揮的吧。悠揚的旋律沁人心脾，充滿着憂愁和痛苦，也飽含着深切的愛，表達了一位流亡異鄉的赤子對祖國深沉的眷戀之情。

冼星海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和申請終於取得蘇方的支持和關照，在「留克斯」招待所分配到一間房子。

可惜，這一切為時已晚。冼星海搬出我們家不久，便大病發作，被送進醫院。醫生們作出可怕的診斷：他已患上白血病。我和立三聞訊後，趕快去莫斯科郊外一個高級療養院探望。療養院是花園式的樓房，空氣清新，環境幽靜。冼星海住的是單人病房，舒適、整潔。我們分手不到一個月，他的身體狀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消瘦了許多，形同槁木，顴骨凸出，但精神狀態反而變得平靜、樂觀了。醫生沒有告訴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一點也不覺得壓抑，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現在的醫療條件這麼優越，我的病是肯定能治好的。」

我和立三只能強忍悲痛，婉轉地鼓勵他、安慰他。雖然醫生竭盡一切努力，但冼星海的病情已近晚期，急劇惡化，終於在1945年9月被病魔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臨終，他躺在病榻上還在憧憬着未來，對前來看望的中國同志們說：「中國的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一定要在祖國首都建立音樂學院，培養高級音樂人才。我理想中，音樂學院將是一座寬敞、漂亮的大樓，大理石的階梯，牆上有明亮的大鏡子，像一個名副其實的音樂殿堂。」……

冼星海從國內帶來的一些手稿以及他在蘇聯期間繼續創作留下的音樂遺產，全部留在了蘇聯，由一個後期伴隨着他的猶太女人佔有。這個人假借冼星海的名義為自己謀利，悄悄地拍賣他那寶貴的音樂手稿，供人抄襲剽竊。據說，蘇聯有不少作曲家，都不同程度地從冼星海的音樂遺產中得到了一些借鑒或啓發。

冼星海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莫斯科，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經中方反覆交涉，蘇方才同意移交給中方，由冼星海的遺孀專程赴蘇帶回國內。冼星海終於回到他生前日夜眷念的祖國。

摘自《我的中國緣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憶錄》